

# 太湖西北部新石器时代考古报告的又一力作

## ——《高城墩》读后记

方向明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浙江杭州 310014)

江阴高城墩遗址位于宁镇丘陵和苏(州)沪平原之间,其北有江阴古渡口、南有太湖古沼泽,属太湖北部地区。这一地区以前曾经发掘过圩墩和寺墩两个著名的遗址,但是由于完整的考古报告未发表,总体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一直不很清楚。20世纪末,随着金坛三星村、江阴祁头山<sup>[1]</sup>、高城墩等重要遗址的发掘,太湖西北区的文化面貌令人耳目一新,使考古界认识到除了良渚遗址群的最高等级之外,“至少还存在着江阴-武进和吴县-昆山-青浦为代表的两个二级中心”<sup>[2]</sup>。

高城墩遗址“是良渚时期又一处规模大,有严谨布局规划和严格建筑方法的高台墓地……墓葬呈人字形向西北、东北方向排列……发掘时找到了清晰的棺、椁板灰以及椁与墓坑的关系……13号墓是迄今为止良渚文化发现的墓坑中最大且葬具结构保存较好的一座大墓……这种随葬玉器等级较高而数量不多的墓葬,可能代表着良渚文化的另一类型。”<sup>[3]</sup>

“高城墩遗址所在的苏南地区……可能代表着与宁镇地区、上海福泉山一带地位相若的另一个中心。需要重新认识良渚文化的多中心现象。”<sup>[4]</sup>

第一段引文是当时简报的基本结语部分,第二段引文则是1999年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委员会评语,它们非常恰当地归纳了高城墩遗址的田野主要收获、突破以及重要意义。或许也因为如此,江苏省的同行们把这些重要遗址的考古报告依系列进行整理出版,《祁头山》报告墨香未尽,作为太湖西北部新石器时代考古报告系列之二的《高城墩》<sup>[5]</sup>就接踵而至了。

高城墩遗址对于良渚文化研究的重要自不待言,而对于个人来说,这也是我接触最多的省外良

渚时期遗址,自然有着不同寻常的深厚感情。1998年11月,我们一行随芮国耀先生途经南京,23日在璜土镇由王岳群先生作东就餐后,建芳兄遂陪同大家到高城墩踏勘。那时钻探结束刚不久,探眼尚历历在目,建芳兄按捺不住的欣喜至今印象深刻。1999年12月,也就是高城墩考古如火如荼之时,我又随芮先生到了高城墩,对于M5已是惊叹不已,甚至还建议正在发掘的M7,既然已近土墩边缘,干脆下狠心挖破以观察大家翘首以待的棺槨葬制。在高城墩整理期间,我也与报告执笔之一左骏联系颇多,这一联系一直到今年年初他们邀请牟永抗先生撰写报告的序言。今夏,《高城墩》寄到了海宁博物馆并转交与我,真是先睹为快。作为一个与高城墩有着十年缘分的考古工作者,觉得很有必要与大家交流阅读后的感受。

—

首先,从报告的字里行间足可让我感到高城墩考古是一项精心准备的发掘。

常州博物馆收藏的5件高城墩玉器得于1984年,计有琮2、璧1、筒形器1、琮式锥形器1,不过有底纹衬托的繁缛神人兽面图像琮Yu:316于1995年才正式公布。1987年5月,在瑶山M10出土的19号琮图像构成与之极其接近,由于前者迟于瑶山简报7年面世,颇有些遗憾。这批器物“均出于土墩的西南处”、“土墩高出地面约8米,现呈椭圆状,东西长约60、南北宽约35米”<sup>[6]</sup>。后来经过发掘者调查核对,确认为M13所出。

高城墩东西基本保持原貌,南北由于建窑、取土等蚕食,具体范围在正式考古发掘之后才得以确认,“现有文化层大致在长、宽各60米的范围以内”(第5页),可见当时常州博物馆获取玉器后是

经过实地踏勘的。我不知道1985年10月遗址被江阴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是否与此直接有关(第7页)。不过1982年南京博物院的考古前辈对此进行调查后“并拟发掘。后以为遗址主体破坏较甚,已失去发掘价值”(第7页),确实是件失之交臂的憾事。

作为发掘领队,建芳兄关注高城墩当然不仅仅因为他是武进籍人,也不仅仅因为1994年在常州博物馆整理乌墩报告时具有的天时地利,或者说是“孤灯清冷”的夜晚因为那位大狼狗适时的敲门才会真的想去看看高城墩那么简单(第220页),据我回忆,当时建芳兄确是对“墓地的构建十分着迷”(第220页)。1996年9月,他就曾携带《良渚文化墓葬研究》到我们普安桥工地参观交流,除了不遗余力地从社会组织结构论良渚的“宗族”说之外,便是对于赵陵山遗址墓葬布列的着迷,他一再提醒我们当时瑶山的良渚人可能是从北面上来的,应当注意“祭坛”北坡的迹象,汇观山也不例外。

建芳兄对于考古的执着,我是有深刻体会的。花山遗址的短期发掘虽然可以理解为高城墩发掘的前奏和际遇,也只不过是顺理成章的一个插曲而已。胸有成竹,牟永抗先生在报告序中喻其为有备而来的“猎鼠之猫”,并无过誉。

1999年11月~2000年6月的高城墩发掘分两个阶段进行,实际上,第二阶段的发掘主要是对于土墩西北部的了解,如T0205和T0305北部的发掘,发掘主要集中于第一阶段。从布方以及发掘递进看,发掘目的和思路相当清晰,除了在土墩主体范围规范布方外,还在原应属土墩东南部的被破坏的低洼处布T61,不但确认了遗址的大体范围,也对土墩的营建过程有了大体的了解。美中不足的是那时未用水准仪测定详尽的绝对标高,否则,遗址的复原更是锦上添花<sup>[7]</sup>。发掘者也并未因为M1的确认而一味转向土墩西部墓葬集中区域的发掘,而是继续对东部“红烧土堆积范围”的整体揭露。建芳兄在后记中特意提及,“先挖东半部,主要是想弄清楚土台是如何堆积的。东半部破坏比较严重,先挖可以帮助大家进入状态,熟悉地层”(第221页),诚如斯言。

自1999年11月22日下午确认M1(第30页),至2000年1月20日清理完毕M13(第128页),寒冷的天气、巨大的工作量,但是同时还伴随着野外收获的欣喜,这是只有长期在一线的考古作业人员才能有的体会。

其次,棺槨制度的探索和确认无疑是高城墩

考古最为重要的收获。

对于良渚墓葬葬具结构的探索,建芳兄在后记中谦虚地言及,“良渚文化大墓有深坑和棺槨制度的事实首先是由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发现的”(第222页)。我们从已知的材料中得知,早在1957年湖州邱城第一次发掘时浙江的考古前辈就曾剥剔出新石器时代浅浅的墓坑,随着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浙北地区小墓的发掘中逐渐积累了包括找边剔壁的野外技能,才有可能在反山、瑶山的发掘中取得重要的进展,“有无墓坑对于地层学年代和材料的可靠性都是至关重要的,更是我们探讨墓葬平面布局所表现出的社会关系的基础”<sup>[8]</sup>。反山发掘在葬具结构上进行了有益尝试,确认了与凹弧底棺相配的凹弧形棺床,还根据多层次、多状态堆积的“板灰”痕迹、并结合一些随葬品的出土状况佐证棺槨之间空间的存在<sup>[9]</sup>,甚至在当时还推测可能存在“封土层”。反山M14还尝试了台阶式的分层剥剔,次年瑶山的发掘亦然。1995~1998年,桐乡普安桥中日联合考古发掘在这一野外课题上取得了突破,M8等诸墓通过平剖面结合方式确认了超越墓口范围的封土覆盖,明确了槨、棺各自空间的存在,并大致可以确认槨盖板原先的平整以及棺盖原本的弧凸。不过,客观上说,棺槨的具体形制还不是十分的明了,野外作业探索过程中的艰辛,以及作业结果的记录的困难至今仍是令考古界头疼的事。

高城墩的考古同仁在发掘时显然对此已有了精心准备和迫切的希望,按照报告后记所述,“尤为重要的是M11清理时将棺槨问题基本解决了”(第221页,图二之1999年12月29日工地日记)。我从报告诸墓章节之“墓葬形制”段落中可以看出:M3确认了凹弧状的棺底形状(第44页);M5清理时再次明确了凹弧棺底,而且确认“棺放置在槨内,上有盖板”,也承认“由于棺外直接套有木槨,棺、槨糟朽后不易分辨,棺应略小于槨”(第55页),后者的观察和结论,尤为重要,一方面说明了当时棺槨形制的复杂多样性,另一方面或许也提示我们槨在某种含义上似乎也起到了直接保护棺的可能性。关于M5随葬器物的堆积层次,简报似乎说得更为简约明快:“M5陶器叠压在朱砂上,朱砂又叠压在玉璧上……M5的4件石钺是放在棺槨的缝隙”(简报第11~12页);《1999中国考古重要发现》也有所描述:“独木棺口呈长方形,上有棺板,板表面多饰朱砂,北部板上放置陶器。棺的东西两侧和南北两端均向内凹,有些器物就出土在凹进部分,

如M5。”<sup>[10]</sup>如果说M5的剖面图因为缺乏野外照片的佐证还不能有力地说服读者,那么M8的观察和记录就更为详尽了:“在近墓底约0.01米处(报告当有误,应0.10米——笔者注,下同),出现一层夹少量黄褐色微小颗粒的青灰色土层(也就是俗称的‘板灰’),与四侧椁板朽痕近似(棺椁若紧贴,在野外剖平面上确实很难区分),该土层应为椁内所置棺木的遗迹。从保留的隔槨可以看出,其为微弧凸状,随葬器物均出于该土层中,清理完毕后,可见底部明显下凹(这样,类似独木凹弧底棺的基本形制也大体明确了)。”(第78页)M8至1999年12月20日清理完毕,同日也确认了M11葬具的基本结构应与M8类似,说明高城墩这类一椁一棺的葬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野外探索和发掘思路步步趋进,值得肯定。

当然,高城墩良渚显贵大墓的葬具还远非一椁一棺那么简单,M13又发现了另一种形式的葬具结构。从墓坑建设规模、随葬品组合情况等说明,M13应是高城墩遗址的核心墓葬,长4.4、宽3.2、深达1.9米,也是目前良渚大墓清理最深的墓葬。M13长方形框形板灰在清理至深0.8米时出露,并随着发掘深度的增加,发现东西向残留的条状板灰,发掘者判读为木椁“盖板”自然合理,近墓底才发现“0.06米的地板朽痕”,并“又发现底板仍东西向往两侧延伸”(第115页),这样,也就基本说明M13是一个搭建的巨型木棺。在简报公布时,我尚在怀疑这一推断结论,除了M13的剖面图有“美化”之嫌外,我难以想象,这么一个长达3.9、宽1.9米的长方体巨型木棺是在现场搭建呢?还是扛着放入墓穴的?在M13之前清理的M10可能也与此形制接近,不过报告文字与图在“棺”、“椁”上不统一,建议暂以“棺(椁)”表述为妥。

2001~2002年发掘的桐乡新地里遗址,发掘者将发现葬具的墓葬分为三种形制:两侧与底部都较平直的长方形棺(椁);外有长方形椁、内有弧棺的双重葬具;弧棺<sup>[11]</sup>。显然第一种形制就与高城墩M13颇为接近,如新地里M28等。新地里遗址是继桐乡普安桥发掘之后浙北地区葬具结构的新发现,也证明以高城墩M13为代表的这类形制确实存在。

同样,我们再回过头去检索青浦福泉山M139,该墓东北角人牲怎么能压在“似两块凹弧形大木相合”的完整独木棺葬具的浅墓坑上呢<sup>[12]</sup>,现在看来M139大概不会限于长2.99、宽仅0.95、深也仅为0.16米的空间内<sup>[13]</sup>,墓葬规模似有重新推

敲的必要。

再者,谈谈高城墩的玉器。

高城墩墓地共出土玉器三百余件,种类和数量虽然不能与反山、瑶山媲美,但代表良渚玉器的琮、璧、钺三大礼器很完整,在太湖西北部已属鹤立鸡群,是高城墩遗址的主要内涵。M13:13琮很值得一提,报告配置了该琮所有面的图像和照片,精心上墨描绘,摹本的精确度极高(此处顺便谈一点我对考古绘图的看法,对于线图制作过程中的艰辛和完成后的愉悦,我深有体会:我认为照片、考古墨线图和传统的以黑白两种层次区别为特征的拓片是图像层面上表达器物的有效手段,三者各有特点,彼此互补而不可替代,这是电脑制图永远比不上的,我也相信今后考古绘图尤其是器物图绝不会完全由机器来承担),它与瑶山M10:19琮图像结构极其接近,而且瑶山似乎还是高城墩的简约版。当然,最重要的是高城墩M13:13神人节之凸鼻下方居然还雕琢有上下獠牙的嘴(图一高城墩M13:13和瑶山M10:19琮图像的比较)。《文物》1995年第6期初次发表时之图一线图虽有简单描述,但文字却未涉及,1995年由邓淑蘋先生编著出版的《蓝田山房藏玉百选》(年喜文教基金会)图12之琮亦然。

李新伟先生在《瑶山》书评中关于插图的过誉之词,称“融入了绘制者的学术素养和真诚”<sup>[14]</sup>,我在这里转送给左骏,希望他再接再厉。

谈及良渚文化玉器的研究,我还是愿意再次引用郭大顺先生在“红山玉器的历史地位”中所说的,“玉器是史前考古文化中技术含量与文化含量最高的文化因素”。良渚文化是长江下游地区新石



高城墩 M13:13

瑶山 M10:19

图一// 良渚玉器刻纹



器时代的最为重要的一支考古学文化，也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过程的钥匙和焦点之一，作为良渚文化主要内涵的考古学玉器研究是这一课题研究的基础和主要内容，也将是今后工作的主要突破口。最近，随着良渚文化中心良渚遗址群莫角山中心址“良渚古城”的重要考古发现，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有关中华文明起源的课题研究还是要（至少部分）回到显贵大墓葬制和玉文化的研究中来。

第四、高城墩高台遗址的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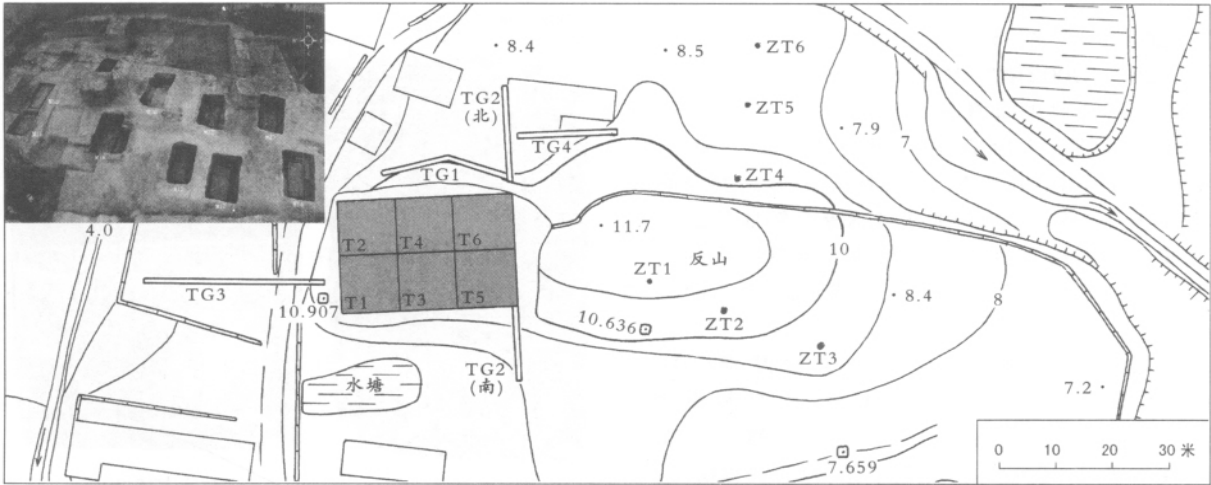
高城墩遗址在发掘前曾经遭受到种种破坏，但是遗址的基本格局依旧清晰，土墩的西部是以M13为核心的墓葬群，虽然似没有如同样有核心墓葬的反山、瑶山显贵墓地中的墓葬排列那么有序、规整，不过在一处墓地中也有墓坑规格相对较小、随葬品数量和种类匮乏的墓葬，甚至如完整的M9仅随葬陶壶、杯和石钺各一，无一件玉器。报告编写者尽管认为高城墩墓葬的年代有早、晚两期四个阶段，但是从相对年代的排序上，大体上可以相互衔接（第168页，图一四五）。高城墩遗址土墩的东部主要为“红烧土堆积”，长35、宽度超过4.6米，“由北坡开始，呈45°~60°斜坡状由低（北）向高（南）堆积”，西部还被报告认为是晚阶段的墓葬的M2、M10所打破。红烧土台面上除了已经修复的被分成三堆、各相隔均约15米的78厘米高大陶瓮之外（第22、16页），还当有为数不少的夹粗砂大口尊（第15页），这一遗迹不但重要，性质也颇值得今后遇上类似者细究，笼统地归之为“祭祀”遗迹当然简单。目前对于上海青浦福泉山红烧土堆积的读识，还有对于良渚遗址群莫角山红烧土“燎祭”的判读等等，均属类似现象。1999~2000年良渚庙

前第五、六次发掘的也有同样的迹象，我们的推测应是一处特殊的建筑基址，往南一侧倾倒的大块红烧土块（后依牟永抗先生的建议，改作“坯料型红烧土”<sup>[15]</sup>）是这一特殊建筑的废弃物。我们期望今后野外考古在这一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2002年为了结合《反山》报告的出版，进一步确认反山墓地的范围和是否存在晚期土台的可能，我们还在反山的东部进行了小心翼翼的钻探<sup>[16]</sup>，Z1~Z3表土层下即出露夹杂红烧土颗粒的褐色土层，不过仅0.2~0.3米厚，其下质地纯净的黄褐色土至厚2.2米仍未及底<sup>[17]</sup>。后来我们推测反山现在以M12为核心的墓地不但南北基本完整，东西也大体无误，反山东部土墩之下的堆积形状是很有可能如同高城墩的这一模式，若是，那将是高城墩考古带来的另外一个意外收获（图二 反山遗址西部发掘区和现保留的东部高墩区域）。

二

当然，《高城墩》在一些细节上还可以更加完善。如：野外的照片终究少了一些，尤其是关于墓葬葬具清理过程中的记录，“红烧土堆积”亦然，又如M8:2琮为仅存5片的残碎，看碎片的照片质地似较坚硬，是有意打碎的吗？野外需要一张出土的细部照片；野外的平面图还不够精细。我坚持认为考古学不但是科学的考古学，还应该是美的考古学，尤其是陶器在墓葬中被压扁碎裂，我觉得还是需要将类似的这些特征在平面图上清晰地描绘出来。墓葬的剖面图也如此，一些墓葬由于涉及到今后的展示而未及底，剖面情况自然不得而知，而另外一些还是要将“实测”和“局部示意”区分开来。报告墓葬之每节均有题图，这也是一项创新，若再



图二// 反山遗址西部发掘区和现保留的东部高墩区域

相应标注墓号,就更加锦上添花了。一些文字细节也有待斟酌,如据村民描述,高城墩遗址原来“高度约10余米”,后“降至5米左右”(第4页),而发掘时提到“开口于耕土层和明清层之下的晚期墓葬也较多”(第10页)等,说明原先的10米高至少是个夸张的、久远的说法,或就是个伪传说。对于玉器个器的描述,倒也不是报告独个别的问题,如玉器的色泽描述该怎么表述?包括我们在编写类似的报告时对于玉器玉版的校色用什么的大致标准?玉器的测量数值如何作?对于后者我倒是建议大家应该参考邓聪先生类似对于玉玦的测量规范<sup>[18]</sup>,这些是我们正在和今后都要面临的问题。第四章“研究”部分费心、详尽,但类型学的型式划分确有重复、繁琐之感。另外,就出土器物而言,随葬品组合的性别特征不明显,高城墩墓地中居然没有一件璜、甚至没有一件纺轮,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 三

《高城墩》报告在章节上分为概述、地层与遗迹、墓葬、研究和附表、附录部分,这也是最近几年我们对于考古报告形式的主流方向。自我所《好川墓地》之后,大家都觉得这样的方式好,实际上真正的目的就是尽可能真实、客观地报告野外发掘和室内整理这两项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研究工作,当然也让读者身临其境,几乎无障碍地“互动”。我赞同这就是考古报告的真谛,而不是要什么“通俗化”,要走出所谓的“考古围城”。最近杨泓先生说“考古报告是越客观越好”<sup>[19]</sup>,斯言甚是。

《中国文物报》曾有文回忆早年曾昭燏先生对《大汶口》提出过“卡片”式报告的建议,或许是因为意识形态有异的原因最后不了了之,如果,1974年出版的《大汶口》能够在打着粗体黑字的幌子下,提前30年进入报告的“卡片式”时代,这恐怕和苏秉琦先生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提出同样具有伟大的革命性<sup>[20]</sup>。

任何一本有责任心的报告的出版,作为读者我们要向那些付出辛勤汗水的一线考古人员致敬,他们的姓名被写在报告的“考古发掘和报告编撰人员”中,彩版二、三以及图九、十记录了部分人员的身影,我们应为他们骄傲。其中左骏是以单纯整理者的身份参加《高城墩》报告的整理和出版,这种情况有利有弊,最大的弊端自然是缺乏对于当时野外操作时得失的回顾,这些就需要领队进行弥补了。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整理者首先成为了某种程度上的第一读者,他会以一种检索、甄别的心情去对待发掘资料,这样自然会客观一些。

科学的考古报告经得起时代的检验。世纪之交,考古学领域并不平静,除了学科之属,另有如:发掘性质——形形色色的各种称之为“保护性”的考古发掘,或者甚至被无奈地理解为可以有侧重的“抢救性”考古发掘,以及结合“课题”的“主动性”考古发掘等等尚待界定的非正式考古发掘“俗语”;而于考古学本身,考古学的目的——从带有浓厚证经补史色彩到“走近历史真实之道”的锄头考古学<sup>[21]</sup>,或世纪之交开始以关注人地关系为主的、以研究物质文化现象背后的方方面面所体现出的“考古科学化”课题<sup>[22]</sup>的多样性为宗旨的超越锄头的考古学,以及最近似乎有些被淡忘的不知不觉具有浓厚金石学烙印的古器物学性质的美术考古学。无论何,我坚持认为科学和尽责的田野考古发掘和报告的整理出版是对于祖国文化遗产的最大保护,诚如俞伟超先生引述的,“一个考古发掘者,的确应把尽可能记录一切现象当作自己的职业道德”<sup>[23]</sup>,愿我们从事这一神圣职业的野外一线考古人员共勉,我们以同样的心情企盼着对于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研究有重要意义的《赵陵山》考古报告的出版。

[1]南京博物院、无锡市博物馆、江阴博物馆:《祁头山》(太湖西北部新石器时代考古报告之一)“后记”,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261~262页。

[2][3]江苏省高城墩联合考古队:《江阴高城墩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5期。

[4]“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委员会专家评语,《中国文物报》2000年5月31日。

[5]南京博物院、江阴博物馆:《高城墩》(太湖西北部新石器时代考古报告之二),文物出版社2009年,本篇引文凡是括注“第X页”均引自该报告。

[6]陈丽华:《江苏江阴高城墩出土良渚文化玉器》,《文物》1995年第6期;陈丽华:《常州市博物馆收藏的良渚文化玉器》,南京博物院主编《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第58~59页。

[7]简报的T0405西壁地层图也很重要,但在报告中没有用。

[8]牟永抗:《论良渚——良渚发掘五十周年之回顾》(1986),后收入《牟永抗考古学文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

[9]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

[10]《江苏江阴高城墩良渚文化墓地》,国家文物局编《1999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3~4页。

[11]新地里140座良渚墓葬中,有117座没有发现使用葬具的痕迹,说明在良渚文化中中型等级聚落中,葬具的有无、复杂以及随葬品组合确已成为了区分不同阶层身份等级

- 的标尺。参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乡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新地里》,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319~322页。
- [12]方向明:《史前东方大口尊初论》,《东南文化》1998年第4期。
- [13]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福泉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59页。
- [14]李新伟:《返朴归真——良渚遗址群考古报告之一〈瑶山〉读后》,《中国文物报》2004年3月31日。
- [15]牟永抗:《长江下游地区文明化进程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年。
- [16]考古钻探是考古调查的重要和方便的手段或技术,当然不能被视作是考古的结果。据一些媒体报道秦陵始皇主陵区已打了40余万个洞(探眼),我是有些担心的。《秦始皇陵之争愈演愈烈:到底该谁勘探发掘?》,引自 <http://www.zjww.gov.cn/news/2009-07-02/187463808.shtml>。
- [17]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9页之图二。
- [18]邓聪:《环状块饰研究举隅》,邓聪编《东亚玉器》Vol.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1998年。
- [19]杨泓、郑岩、刘婕:《从考古出发:杨泓先生访谈录》,《南方文物》2009年第2期。
- [20]中国考古学的另一场革命自然要属于欧美传来的“考古年代学革命”的C<sup>14</sup>测年。
- [21]张忠培:《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科学出版社2004年;刘庆柱:《对“考古”的“考古”》,《中国文物报》2009年8月21日,“我以为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发掘’‘复原’‘研究’过去人类及其与之相关的自然及环境的历史科学”。
- [22]赵辉:《从河姆渡到田螺山》,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田螺山遗址研究课题组《田螺山遗址自然遗存的综合研究》2008年11月。
- [23]俞伟超:《关于“考古地层学”问题》,俞伟超编《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7页。

## · 书 讯 ·

《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文集》汇集了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南京大学考古毕业生最新学术成果共62篇,内容涉及各个时期的考古学研究、考古理论与方法、文物研究和文物保护与利用等方面。本书由蒋赞初先生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490页,90万字,单价180.00元。

《扬州博物馆建馆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东南文化》2001年增刊):本书汇集了扬州博物馆研究人员的最新研究成果,内容包括扬州考古五十年总结、扬州历史、重要遗址及出土文物、扬州文化民俗及博物馆学等方面内容。本书共248页,45万字,单价58.00元。

《埭墩山——埭墩遗址论文集》(《东南文化》2003年增刊)内容简介:埭墩遗址是江苏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在此遗址中发现了丰厚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马桥文化等早期文化地层堆积;后期的文化堆积延续到了现代。本书汇集了埭墩遗址一至五次的考古发掘报告和省内外相关专家的最新研究成果,是对昆山埭墩遗址考古工作的一个总结,是研究埭墩遗址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昆山历史的重要依据。本书共

172页,30万字,单价30.00元。

《苏州博物馆建馆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东南文化》2000年增刊)本书汇集了苏州博物馆研究人员的最新研究成果,内容主要涉及考古学研究、吴文化研究、文物研究、博物馆学研究等文物工作的方方面面。本书共192页,35万字,单价28元。

《砂壶汇赏——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东南文化》2007年增刊):

2004年由南京博物院主办、台湾成阳艺术文化基金会赞助,举办了《砂壶汇赏》暨紫砂学术研讨会。展览汇集了江苏、福建、浙江、四川、陕西、山西、河北等七省出土的明清时期29件紫砂壶及台湾成阳艺术文化基金会从所收藏的2000余件紫砂壶中挑选出的30件藏品。来自大陆、台湾两地11位紫砂专家对17世纪到18世纪百年紫砂史上,包括出土紫砂壶、外销紫砂壶、文人紫砂壶和宫廷紫砂壶等类壶进行了讨论,对紫砂材质、工艺、陶艺家、真伪鉴别、壶艺美学等问题作了广泛而又深入的研究。本书共96页,15万字,单价35.00元。

以上书刊8折优惠,欢迎专家学者选购。

地址:南京市中山东路321号 邮编:210016  
联系人:何刚 电话:025-84806201